

一代浪漫主義受難者的 知青記憶

● 陳家琪

1968年，是我們這代人下鄉插隊落戶的那一年。幾千萬初中、高中、大學尚未畢業的「知識青年」及其家庭，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僅僅只是毛澤東的一段話，一條指示，就把全國攪得天翻地覆，可見那個時候「最高指示」的威力之大。在中國歷史、甚至人類歷史的幾千年間，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恢宏無比的政治景觀。作為其中的一員，竟油然而生出一種莫名的豪情與壯志，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政治心理學課題；而且你不得不承認，一句話就能讓好多億人做出同一個動作，有了同一個表情，這自然大大節省了社會精力，覺得甚麼「三權分立」、「言論自由」都只會導致社會分化，浪費精力。統一意志，好做大事，這也是共產黨在不斷獲取的勝利中體會到的一條基本經驗。

怎麼樣能讓全國的人民都一心一意、心無旁騖地投身到統一意志之中（不論大躍進、大革命，或是大建設、大揮霍，背後的那個統一意志其

實一樣）？這始終是一個擺在最高領導人面前的嚴重問題。可以想像得到的幾個方面，比如盡可能地讓民眾更少獨立思考，換句話，也就是最好讓他們沒有多少文化，這總是比較方便可行的一個思路；再比如，就是盡可能地報喜不報憂，多說成就，少談缺失，可以免除人們的疑慮，因為只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有，就是把盡可能空餘的時間都擠滿，使人們都生活在緊張之中，除了體力勞動就是精神勞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也是一種辦法。當然，更有效的，還是把民眾分化開來，不要成為一個集體；但又必須防止個人主義，防止他們把個人事務看得高於一切。

關於為甚麼要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已經有很多解釋了，比如為了縮小城鄉、工農、體腦勞動間的差別；比如為了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把當年的「闖將」放逐到偏遠的山鄉；比如為了解決大量積壓在城市中的年輕人的就

業問題，等等。但就我個人的體會而言，這一切其實很簡單，也很單純，就是為了聽從毛主席的召喚，為了表示忠心，為了證明我們確實是「毛主席的紅衛兵」。那個時候，誰聽毛主席的話，誰就是對的，而且一定會成功，這幾乎就已經成為了一種發自內心的信仰。

為甚麼？——其實沒有人敢那樣問自己。「靈魂深處鬧革命」的目的，就是從根本上把任何質疑、不滿，甚至不安，都消滅在萌芽狀態。但這種消滅，並不是讓你安分守己、閉門不出，而是要讓你豪情萬丈地投身於社會，投身於政治運動。把所有成員都捲入一種共同生活之中，讓不斷的政治運動來填補由於無法參與政治而萌生的離心、渙散和個人主義，這是毛澤東得心應手的政治路數，它既可以消除兩千多年來遺留下來的、從整體上看中國人依舊處於「一盤散沙」的精神狀態，也可以統一意志，好做大事。

我們都知道，在西方的政治哲學史中，希臘城邦是極度典型的政治性聯合體的標誌，到了希臘化、特別是羅馬帝國時期，當帝國取代了城邦，一個共同體本來是為友情、慷慨、仁慈、虔誠、敬重（漢語中的「信義」二字就大約包含着這些意思）這些概念所支撐着，現在則不得不改換為另一套統一的意識形態的統治，在西方社會就是相應誕生的基督教，在我們這裏則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應該說，自秦統一中國以後，「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還基本上有效，也能勉強維持着傳統的「信義」擔當。當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在我們這裏被確立下來以後，那麼相應地，「信義」二字所含

有的道德意識也就隨之消失了。這也就是1978年前一直堅持批孔、批傳統文化、非議道德、反人性論的一個思想觀念上的背景。

就知識青年下鄉插隊落戶而言，心態上不一定全都一樣。就那些躲避下鄉，或從軍（這需要拉關係，走後門），或入廠（成為學徒工，依舊不是件容易的事），或在農村偷雞摸狗、時刻伺機返城的人來說，情況也不一樣，自當別論。僅就我個人而言，是滿懷豪情、奔赴最貧窮的鄉下而去的。這樣的豪情體現在哪裏？就是想要改變農村的貧窮落後。一開始，也是想抓階級鬥爭，以為靠階級鬥爭就能調動起大家的革命鬥志，但這又與我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這一主旨相違背。於是，很快，我們也就發現了再抓階級鬥爭也無助於生產的提升。除了農業學大寨，我們也實在想不出還會有別的途徑來改善農民的生活。那是一段相當苦悶的歲月。

所以我要說，當初愈積極下鄉插隊，愈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充滿豪情壯志的知識青年，也就愈可能向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或者是徹底醒悟，關鍵的轉折點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或者就是依舊生活在對過去那套意識形態的滿懷憧憬之中，因為它確曾在當年給了我們豪情壯志，給了我們理想與信念，也給了我們一段最值得留戀的青春年華。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也無論我們是否承認，當初的那種「美好」（精神狀態、理想、信念、意志、決心）都會一直在暗中左右着我們的價值取向。這種取向，可能在心理上更偏重於毛澤東時代的「無私無畏」，儘管那只是我們自身想像中的一種理想狀態。

所以我更願意從浪漫主義的角度解讀一代知識青年的豪情壯志。這種浪漫主義有如下八個方面的表現：

首先，我們覺得自己是一代「全新的人」。文化大革命給了我們一種信念，就是小將造反永遠是有理的，而且不會犯錯誤，只可能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我們認為自己「生在紅旗下」，基本未受到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污染，所以根紅苗正，是全新的一代革命者，目標是解放全人類。

第二，我們認為自己生長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儘管我們未遇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兩萬五千里長征，但我們趕上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實踐，它宣告反修反帝和世界革命的偉大時刻正在到來。

第三，我們相信我們到農村就能改天換地，把自己的知識運用於農村，以自己的吃苦精神和自我改造的意志來使農村也發生一個根本的變化。

第四，我們由衷感受到貧下中農的淳樸、善良、吃苦、耐勞，也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改造，覺得自己無論怎麼看（包括讀書、思考、爭論），都不如貧下中農那樣默默無聞地改造着自然，供養着全國人民的衣食住行來得實在，所以我們也就從根子裏對讀書與思考的價值產生了疑慮。

第五，我們在農村也組織學習小組，在小煤油燈下刻苦讀書，我那時就開始讀馬克思的書，整日生活在鬥志昂揚的氛圍之中；當然，最後有無數個類似的小組被打成「反動組織」，許多人被判處死刑，但其餘的人依舊努力讀書、思考。我們可以說，正是這樣一些人孕育着一個新的起點；也

可以說，我們是以自己的讀書與思考來「反智」的，因為我們想壟斷知識、智慧所給予我們的一切。

第六，面對農村的貧困，我們會潸然淚下，更多的是將個人感受或經歷寫成日記、詩歌、小說，充滿悲憫之心，但那又不能消極，而是不斷尋找着某種新的表達方式，但總體上依舊是把外在的衝突轉化為內在的梳理、安撫，尋求着某種平衡。

第七，把自己轉化為審美的對象，包括自己破衣爛衫、佇立田間地頭的氣勢軒昂。我記得那時候我穿的衣服是村子裏最破的，而且常常不穿衣服，吃飯也故意不講衛生，故意把受苦當成光榮，把艱難當做考驗，把最困難、最危險的地方當成自己表演勇氣與忠誠的舞台。

第八，在既想改天換地，又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中找到某種同一，這就是對歷史的信任，覺得歷史是最大的實在，而且歷史本身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一定會把最後的



作者（左）1970年夏在農居小屋

果實體現在我們身上；當然，在此之前，應該「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歷史就是我們全部的理想寄託。

就我們在農村所接受到的「再教育」而言，第一，是知道了農民真苦，但當然不明就裏，也想不出令他們致富的途徑；第二，是發現農民的愚昧，他們大都處於未受教育的狀態下，就連我們爛熟在心的那套「大道理」也所知不多，於是感到要改變他們還不如統治他們更便捷；第三，我們的「性教育」都是通過他們的俚語、玩笑、笑話、打鬧和故事而接受啟蒙的，於是我們也就發現了哪怕徹底如文化大革命，也總會有一個角落是「被遺忘」的。於是，或者任其如此，或者尋找另一種更為有效的控制途徑，能夠使社會最下層的民眾也能被觸動、被發動，從而被改造。

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插隊的經歷根本無法保證我們能有一個基本的善惡觀念，想得最多的還是「怎麼有效」；而在農村，除了原先的鄉紳，就只有確立支書的權威，但支書能不能獲得這樣的權威以及他們為甚麼能這樣（當然是由於聽上面的話），卻根本上就想不下去。但農民不相信民主，不相信言論自由，不相信每個人其實生而平等，不相信他們能管理自己，這一點總是毫無疑義的。我們真的看到了農民式的狡猾與自私，比如隨意糟蹋鄰隊的莊稼，偷竊公共的財物，只要有可能就偷懶、磨洋工，隨便撒謊躲在一個地方休息，等等。沒有人會想到這是一個所有制的問題，人性論又不能說，而且貧下中農永遠是歌頌的對象，於是這樣一個過程也就變成了扭曲我們心靈的過程。一談起下鄉插隊的歲月，大家多談的是身體上的

吃苦，很少念及心靈上的扭曲，以及那種由於根本上就想不到出路而萌生的孤注一擲的心理。想不到出路是普遍的，但由於我們在鄉下，由於我們特別想改變農村的面貌，也特別想改造自己，所以無出路的感覺也就特別強烈。

一方面，我們在想像中渴望那種帶有原始性的本能、粗野、對文明的反叛，把西方世界的發達（只是從電影或書本中的揣測而已）視為自己的敵人，所以自然也就從內心深處不相信甚麼人類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我們在心裏還是把自己視為高人一等的「精英」，覺得馬克思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也就是自由實現，但這永遠只能是少數人的事，而且慢慢地，我們就發現了我們自我實現的舞台並不在農村。由於心中有了一種堅信，於是眼前的一切就都成為一種磨練。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們這些出身不太好的人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大為反感，到了農村，無論自己的出身如何，我們又慢慢發覺自己其實屬於「老子英雄」的一類人，因為我們真正發現了貧下中農在各個方面都不如我們，而且是無論如何也趕不上我們的那類人，而他們的一切又是由於他們的「老子」造成的。令我們想像不到的，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之類的祖訓或者格言，竟成為支撐我們無論在任何艱苦的境況下都能挺了過來的一種精神力量。

陳家琪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